

《周易》研究的新开拓

——评《周易美学》

刘清平

作为一部在人类思想史上长期散发着诱人魅力的著名文化典籍,《周易》引起了古往今来许多学者的极大兴趣。不过,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的《周易》热中,有关其美学思想的理论著述却为数甚少。著名美学家刘纲纪先生的新著《周易美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5月版),为我们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这部学富才高、思深意新的力作,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出发,将《周易》放在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宏观历史背景中,全方位深层次地探讨了其美学精神,从而大大拓宽了《周易》研究的领域。综观全书,它的突出特点和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该书成功地坚持了将文字的训诂考证与思想的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正确原则。本来,如何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任何古代典籍都具有重大的诠释学意义,而对于研究《周易》这样一部因多义性常常导致众说纷纭的世界奇书来说,就更是举足轻重。在这个问题上,《周易美学》的指导原则是:既不轻视考证的学术价值,主张通过训诂并结合历史背景弄清《周易》本文的含义,同时又更为强调思想分析的重要作用,注重从现代哲学的高度对《周易》美学精神展开创造性的诠释,由此把握它的活的生命。

从训诂考证这方面看,作者显示了扎实的功力和丰富的学识,尤其是不拘泥于前人似乎已成定见的界说,敢于依据自己对古代历史背景和传统思想发展的广阔视野与深刻洞见,对《周易》本文展开严密细致的分析诠释,从而解决了一些长期未能得到合理解决的难题。例如,在对《周易》一系列与美学相关的词语(象“黄中通理,正位居体”、“大和”、“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刚健中正”等)的考证上,作者就指出了前人注释中某些语焉不详乃至牵强附会之处,澄清了其本来含义,言之有据,令人信服。鉴于历代注家很少注意《周易》本文的美学底蕴,《周易美学》在这方面所做的大量正本清源的工作,显然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不过,作者进行这些训诂考证,又并非仅仅为了弄清《周易》字词的本来意思,为考证而考证,毋宁说,它们的根本目的,是为作者进一步深入探讨《周易》的哲学和美学精神奠定基础。例如,正是通过对“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等文字的训诂诠释,作者高屋建瓴地指出:《周易》实际上是把生命的产生存在提升到了本原性的地位,赋予它以最高的哲学意义。因此,“《周易》的哲学乃是中国古代的生命哲学”。从这一分析出发,作者又通过对《周易》有关美的文字词语的考证,指出:《周易》的美的观念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生命即美”,由此抓住了《周易》哲学思想与美学思想内在联结的中介点——生命问题。可以说,无论在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上,还是在古代美学史的研究上,刘先生的这些观点都是精辟独到、发人深思的,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其次,该书很重视对《周易》美学的哲学基础和文化背景的全方位考察。作者在绪论中明确指出:《周易》之所以能对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同时又大量吸取道家思想的独具特色的世界模式。由于揭示了《周易》在古代思想史上的这种独特地位及其与儒学道家两大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该书对《周易》美学思想的分析研究,就不同于那种单纯就美学谈美学的肤浅之见或望文生义的任意发挥,而是具有丰富历史感和高度哲理性的深层次诠释了。

举例来说,该书反复强调:《周易》生命美学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它认为“美的东西必定是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能给人带来幸福与吉利的东西。”这一论断并非仅仅来自对“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等语句的训诂考

证,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它实际上是建基在对《易传》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秦末汉初建立一个强大统一国家的历史要求),及其对儒家思潮(特别是对重视事功、主张富国强兵的荀学思想)的继承发展的深刻分析之上的。所以,《周易》美学精神主张美不是与功利不能相容的,乃至要求把美同治国平天下的功业紧密联系起来,就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具有深刻必然的历史原因。

再次,该书十分注意将《周易》哲学和美学思想与西方哲学和美学中相关的思想加以比较,运用辩证的观点分析其异同,评价其优劣,一方面既反对妄自尊大,不讳言《周易》哲学和美学思想由于历史的局限所形成的种种弱点,充分承认西方哲学和美学有关思想的长处,另一方面又决不自菲薄,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两千多年以前的《周易》思想比西方思想(包括西方现代思想)更伟大、更合理的地方,从而有力地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易美学》第三章对中国古代交感论美学与西方模仿论和表现论美学所做的精彩比较。在《中国美学史》中,刘纲纪先生已经提到:《周易》有关“交感”的观念与古代美学思想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系。在《周易美学》中,他更强调指出,中国古代美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在于它始终是以心物交感而产生的情感表现来说明艺术的产生与本质;而从哲学上看,这种古代交感论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础,最初正是由《周易》奠定的。然后,刘先生就通过中西美学的深入比较,揭示了中国古代交感论美学体系的独特之处,它一方面比西方古代模仿论美学更深刻地把握住了审美与认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注重通过艺术的抒情功能去探索人生存在的终极意义,充分肯定主体在审美和艺术创造中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又不象西方现代表现论美学那样,片面强调艺术对情感的表现而根本否定艺术的认识意义和叙事功能,企图用主体的内心意识去取代、吞并现实世界,而是主张通过“交感”即相互作用,达到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尽管这种古代的交感论美学思想也存在着淡化乃至回避现实生活中复杂的矛盾冲突和异化现象,将艺术和审美情感狭隘地伦理化、虚幻化,乃至束缚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等弱点,但这些缺陷却不能用西方的模仿论或表现论美学来弥补,而只能用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映论来克服。刘纲纪先生的这些看法,精辟而中肯地概括了中国古代美学对审美和艺术创造中主体与客体关系问题的解决的根本特点,发前人所未发,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上具有独创性的意义。

最后,该书十分强调深入发掘《周易》哲学和美学思想的现代意义,重视从现代的高度分析思考古人的思想与现代人类思想发展的联结问题。这种做法或许会被某些人看作是任意曲解古人思想的“六经注我”。然而,从诠释学的角度看,任何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客观公正的“我注六经”,只要是确有“我”在,其实也就等于是“六经注我”。因此,关键并不在于能不能够“六经注我”,而在于怎样“六经注我”,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六经注我”。在这方面,《周易美学》对《周易》思想现代意义的挖掘探讨,始终是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使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思想融汇到现代思想中去,并使它为世界各国所了解为目的。也正是由于《周易美学》坚持了这一正确目的,所以,它在一系列中西比较中对《周易》生命哲学和美学思想、效法自然的朴素唯物主义主张、交感论和意象论的美学观念等所作的具有现代意义的阐释,就根本不同于那种牵强附会的曲解臆测,而是在深刻揭示古人思想本来面目的基础上,合理地说明了它们在当代思想的发展洪流中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兹以该书对“观象制器观念即中国古代的技术美学”的分析为例。虽然严格说来,技术美学是一门正式诞生于二十世纪的现代学科,但作者的这一论断却并非是对《周易》有关思想的超历史拔高。作者通过具体的历史分析首先指出:观察天地万物之象(包括卦象)及其形式美的规律,对于古代中国人制作器物的生产劳动具有重要的意义,然后进一步阐明了《周易》的观象制器思想,其实也就是“要求器不仅是实用的,而且还要能体现天地万物之美的形式、形象。这样,制器的活动同时就带有美的创造的性质,器的功能与美(这是一切技术美学的根本问题)不是不能相容的,而应当是彼此一致的”。就此而言,《周易美学》在这个问题上的论述,实际上为我们在当代技术美学的领域中如何继承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提供了富于启迪意义的建设性意见。

诚然,由于《周易美学》要以大量篇幅进行文字的考证训诂、哲学思想的深层分析、中西文化的比较评价和现代意义的发掘探讨。因此,对于一般青年读者来说,它也许显得不是那样通俗易懂、轻松有趣。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工作又大大提高了该书在古代美学研究、尤其是《周易》美学研究方面的高品位学术价值。对于那些有志于在这一领域内从事理论研究的读者来说,也许正是《周易美学》的这些方面,才是特别值得注意的。